

我的“忘年交”黎树祥伯伯

■聂茂



本版制图：何芬

火车，在那一处拐弯

■陈中奇

我上初中时，学校在离家八十里外的另一个镇上。通常，我都步行一段，再搭汽车去，但也可以选择坐火车。

京广铁路线刚好穿过我所在的镇和学校所在的镇。当时，每天有一趟从衡阳至怀化的绿皮慢车，早发晚归，遇站即停，且票价便宜，单程才两块钱。可惜，我家离镇上太远，发车太早，担心赶不上。母亲还说，不要坐火车，小孩子家的，坐过了站就麻烦。那是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定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仍然想去坐火车。

有一回，天不亮，我就起床吃饭，打着手电光，听着满村的狗叫，赶第一班挤人的公共汽车，到镇上火车站时天才露丝亮。记得大概是早春，天气阴冷，我穿着棉衣，背着行李，呵着冻手，在铅灰潮润的长长的水泥站台上候车，旁边就立着一块四方白底的站牌。我打量两道银灰的铁轨，箭一样从远处奔来，又射向远方，成了一个黑点，小心情别提有多兴奋和期待，不时看看站楼上的挂钟，心里卡着点，老怀疑坐的车次早过了。一个红嘴巴黑鼻孔的货车机车头开过来，像只大田螺，“吭哧吭哧”大口喷着蒸汽，乳白的汽浪涌扑过来，迅即淹没墨绿的灌木丛和半边站台，我以为烫人呢，赶紧避让，可白汽又迅速地消散。在站台上碰到一个镇上同学，他高大而年轻漂亮的母亲，穿着笔挺的黄色毛料长风衣，亲昵地陪着他来候车。又陆续来了些看似同校不同班的学生和其他人，站台上人渐渐多起来了。我初次坐火车的孤独、紧张和忐忑不见了，平添一份冒险的新奇和快乐——有同学在，不会忘记坐过站了。

该来的绿皮车不紧不慢地准时到达，舒缓地停稳在站台旁，候车人群立刻引起一阵骚动。上车时仍显拥挤，穿制服戴暗红臂章的列车员对着堵住过道背包袱的乘客大声喊：“老乡，别挤啰，大把位子！”大家赶场似的，在吵吵嚷嚷中安顿下来，才归于平静。绿皮车总让人亲近，好像是从田野绿色里裁下来一大块似的，外皮是绿的，车厢座位硬邦邦，坐垫和靠背皮也是一色绿，绿得沉静。推开车窗，一眼的田园山水，窗外风声丝丝低吟。心定了，我不觉得冷了。跑起来，我喜欢听火车的声音，“咗咗——咗咗——咗咗”，车轮有节奏地撞击着闪亮的铁轨，铁轨压着枕木，枕木压着“喳喳”响的棱角坚硬的铺路碎石，感觉轻微的弹性起伏。

这跟坐汽车差别很大。“小四轮”汽车往上颠簸，爬坡过坎，把人抛到腾空而坠，得常抓扶手之物。而火车，却像穿着钉鞋在煤渣路上奔跑，每一次“咗咗”，都是向下狠狠抓地的声音，牢靠踏实。车轮的节奏好似应着心跳的速率，连着地心，连着空气，雄浑有力，“咗——咗”，扣住——前进，再扣住——再前进。车上其实很空，据说这趟车原本是铁路段职工上下班的班车，像我这样的学生碰巧搭便车。车速慢，“哐当哐当”，我摇摇晃晃去看新鲜，从车头到车尾，穿过挂着白窗帘铺着白桌布的餐车，看两节车厢接缝处之间的位移和摩擦，洗手间和茶水间也得试试，遗憾是看不到驾驶室。火车一路经过几个小镇小站，只记得车过洣河上的大铁桥，那是条清澈干净、蓝幽幽的全县人民的母亲河，两岸水草丰茂招摇，山上树林郁郁葱葱，如行画中。

坐到衡山火车站下车，再走两里路即可到学校。这是我上中学时唯一一次坐火车去上学，对于火车的记忆却不止于此。

记得初中一年级的一个晚上，熄灯就寝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侧着身子看武侠小说，太入迷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来查夜，我当场被抓到。当他掀开我被子时，我转脸问：“谁？”一边揉着眼睛，还没回过神来，以为是宿舍同学恶作剧。“拿来。”他语气平和，小声又不容置疑。我看清是老师，有些慌乱，茫然地把书递给他。他一只手收了，另一只手却仍执着地向我伸着，我又把手电筒给了他。他似乎心满意足，一句话也没再说，在宿舍里巡视一圈就离开了，留给我的却是人生第一次失眠。

我胡思乱想，突然悲从中起，蒙着被子哭了起来。并不是因为心疼那本书和手电筒，尽管书是借的，看一大半了，手电筒是家里带来的，干电池是用零花钱买的；并不是担心违反纪律受严厉批评，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老师后续会怎么处置；并不是有多么深沉的罪恶感，而是被一种负疚感瞬间扼住了心灵，非哭不可。这种负疚感，多半来源于常听老师的口头禅：“你们多想一想，你们的父母亲人在家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吃苦受累赚钱供你们上学。”我脑海里立马浮现父母亲挑重担汗流浃背的画面，含辛茹苦的样子，还有殷切期盼的目光，眼泪便像春天池塘涨水决了堤坝，哗啦啦淌得一塌糊涂。哭累了，我也不敢出声，露出头来透气，而室友都已安静入睡，只有从窗口处照进来皎洁的月光，斜斜地投射在宿舍中央的地板上，格外清冷。

在月光的寂静里，我意外地听到火车的声音，好像一条扔给落水者的绳索，“咗咗——咗咗——咗咗”，清晰异常，仿佛就在窗外，就在楼下。我知道，学院围墙外边的山下便是京广铁路线，上面跑着我坐过的火车，还跑着奔赴全国各地我没坐过的火车。我以前从没有留意，在学校能听到火车声，更别说在这样的深夜，而今觉得那声音像水洗过似的，刻在记忆模板里，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每个音节都打在窗口的月光之上，敲在我的心弦之上。我睁着大眼睛，听了半夜的火车，一辆又一辆，一段又一段，好像就是在演绎我的心情。我还知道，那段铁轨从衡山火车站出来，直行一段，不远处即是沿着山下峡谷地势的一个大拐弯，拐弯之后将进入黑沉沉的穿山隧道，那山叫抛石岭。每次围着山头早操跑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铁路的全景。我更知道，这个大拐弯，正是课本上欧阳海推马救列车的地方，对面铁路边上就建有欧阳海烈士纪念馆，横跨铁路的公路桥叫欧阳海桥，旁边村子叫欧阳海村。显然，这是一个英雄的拐弯，是一段英雄的铁路。我深深地感到羞愧。

第二天早读，老师背着手，手指里勾着我的手电筒，末端扣手的布条来自我撕下的旧衬衣破布条。他在我座位前走一圈又一圈，没有把手电筒还给我，也没有说一句话。那个早读，我一句课文也念不下去，但我至今仍感谢老师。

现在，京广线大提速，列车一般会在衡山站短停，而我镇上的火车站更没落。京广高铁又通车，走新路线，县里没有高铁车站，看不到“子弹头”高速列车。校外公路早成了高速路，好多地方大变样。即使一切都在快速变化，铁路那处大拐弯应该都还在的，至少在我记忆中仍是老样子。

窗外狂风大雨。天空乌云压城。这是2023年1月27日奥克兰的清晨。我睁开眼睛，习惯性看了一下手机，好友叶向荣的信息突然弹跳进来：“兄弟早！我和Lisa等会出发去机场，飞厦门，晚上11点到长沙。岳父的追思会下周一行。”

Lisa是叶向荣的妻子，叫黎要红。她是黎树祥老人的大女儿。叶兄和黎姐当天要从墨尔本赶赴长沙。

2022年12月29日，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在国内疫情汹涌之际，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奥克兰。

元旦那天，我特地给黎伯伯发去祝福：“黎伯伯好！疫情三年，诸事不易。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的一年，归其安，物处其所。衷心祝福您及家人康健喜乐，吉祥如意！最茂于奥克兰。”

我也给远在墨尔本的叶兄送去新年祝福。

岂料，2023年1月5日晚上11点，我突然接到叶兄的短信，说岳父“因脑内出血今天下午去世，走得安详，走完了他美满的一生。”

我怔怔地看着这条短信，这是真的吗？那个乐观豁达、总是微笑地看着我的人驾鹤归去了？

那个每天写日记、经常游泳、阳光灿烂的人永生了？

那个积极拥抱新生事物、会用电脑炒股、年轻人做的许多事情他都会做的人再也见不到了？

那个一直要挑战并誓言打破写日记吉尼斯纪录的人再也不写日记了？

怎么可能！我不信，我真的不敢相信啊。在我的心中，黎伯伯一直不老，他一直在我的眼前乐呵呵地晃动啊。

2022年11月5日，在深圳处理自己公司事务的叶兄回到长沙，那天中午，我和叶兄陪黎伯伯一起用餐。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我与黎伯伯的最后一次相聚。

当时，我看他气色不错，问他还在写日记和游泳不？他点头微笑，说过些日子，就去三亚度假。那些日子，国内疫情持续紧张，我问他睡眠如何？他说每天晚上吃三粒叫“睡安片”的中成药，睡得不错。我请他将这种药给我看一下。

不料，刚一起坐，椅子脚有点问题，他的重心不稳，一下子半坐到地上。

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问他怎样？他笑笑说没事，并说幸亏他这些日子在练习坐桩，腰身才没有跨下去，否则会仰翻在地，后果难料。

实际上，由于心梗，不久前，他还送过一次医院，被医生下过危病通知书。但他十分乐观，又被阎王推了回来。

说起来也是奇迹。早在三十多年前，黎伯伯就被一家著名医院下放过死亡判决书。医生通过病例切片，说他患了癌症，最多再活半年。黎伯伯没有被病魔吓倒，依然保持宁静淡泊之心，从容面对病情，坚持锻炼，没有停过一天日记。一年后复查，居然不是癌症，身体也慢慢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黎伯伯究竟经历了什么。

二

说起来，我跟黎老成为忘年交，还是因为他的女婿叶兄和女儿黎姐的原故。

1999年3月31日，我去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留学。一个多月后，在汉密尔顿的一个菜市场，意外地碰上叶兄和黎姐。此间我并不认识他俩，只因他们说长沙话，既意外，又亲切，我们就此相识。后来在叶兄家里，我见到了黎老。我叫他黎伯伯，他叫我聂博士。

黎伯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乐观，健康，谈笑，幽默。虽然当时他已经68岁，但他红光满面，精力十分充沛，与我们年轻人打乒乓球，挥拍有力，腾跳扣杀，气势强劲，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叶兄家，与黎伯伯在乒乓桌上较量一番，然后开怀畅饮，享受美食，谈笑风生，乐不思蜀，这也是我四年留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

我很庆幸，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不仅遇见了积极进取、乐于助人的叶兄和黎姐，而且认识了永不放弃、昂扬奋发的黎伯伯。

黎伯伯是长沙县黄兴镇人，1931年生。1949年在湖南平大中学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投身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派到湖南省青年团校学习，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服役27年。1976年转业到长沙自行车总厂任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厂长。1986年7月离休。他从10岁开始，坚持写日记，任何情况不间断，一生共记下一百来本日记，约1300万字。《长沙晚报》曾连载他的日记两个多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2004年初，我学成归来，又在湖南日报工作过两个多月时间。我写的头一篇通讯，就是《一个古稀老人的日知录》，发表在三版头条，讲的就是黎伯伯的事情，并被报社评为年度优秀稿。

黎伯伯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曾为一些人平反提供原始资料，湖南卫视等主流媒体也对他事迹多次报道。正因

为此，我鼓动他摘选部分日记出版。在叶兄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底，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日记精选《脚印》，封面设计是黎伯伯的两个外孙女叶璐、冯格微合作完成的。《脚印》共四卷，根据不同年代分别取名为《春风篇（1941—1963）》《夏日篇（1963—1984）》《秋景篇（1984—2005）》《冬情篇（2006—2017）》，字数总计150余万，图片数百帧，时间跨度77年。全书文字简练，语言质朴，内容丰富，细致而温馨，清晰记录了黎伯伯的生活轨迹，真实展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和文学价值。这套图书不仅是黎伯伯本人和家人的财富，更是社会和国家的财富。

2018年1月14日，黎伯伯迎来他人生高光的又一时刻。在长沙市图书馆，由湖南读书会组织的新书发布会在此举行。会上，我做了《日记体写作与历史镜像》的发言，回忆与黎伯伯交往的点点滴滴以及四卷本《脚印》出版的重要价值：“厚重的历史，时代的巨变，中国的镜像，岁月的沧桑，一切的一切，都浓缩在一位87岁高龄老人的辛勤记录中。”

事实上，早在几天前，长沙部分媒体就对活动进行了提前预报：“一个人的日记，一代人的记忆”。当天的分享会，人头攒动，掌声不断。国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媒体人黎勤俭、戴海、陈善君等，我的挚友、光明日报资深编辑田军先生以及两百多名读者一起，探讨黎伯伯日记体写作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新湖南等媒体及时作出详细报道。

2022年5月31日，由我担任主任和首席专家的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在中南大学揭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集红色文化创作、传播、研究三位一体，极具特色的专门机构，一大批优秀的红色文化创作者、传播者和研究者欢聚一堂，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会上，长沙城解放的见证者、91岁的黎伯伯向中心捐赠50套日记体图书，成为包括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在内的各大媒体报道的一大亮点。

三

今年的春节，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师长发来新年祝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歌颂在疫情中始终守望相助的人民，诅咒一切骗人的谎言，悼念所有本不该离世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愿新的一年佑苍生，子民无恙，每一个善良的人身体不再乏累，眼中不再含泪，心中依然有光！”

黎伯伯，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您是否还会跟我打乒乓球，还会去游泳，还会天天写日记，还会谈笑风生，还会计划去墨尔本看看叶兄和黎姐的新家，去美国看看外甥女，甚至接受我的邀请，来奥克兰住些日子？我想，您一定会认真考虑的。您觉得虽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但还是有些短暂，您还没有活够，您的思想还那么年轻，您的计划还那么远大，包括再出一本两本日记精选，再开一次新书分享会，再次向世人展示一个平凡而不平凡的人那高贵不屈的灵魂，您像大地上蓬勃生长的小草，用坚韧的心和充满野性的生命力，迎接每一个春天的到来。

黎伯伯，您知道吗？为了表彰您在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时代精神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还打算聘请您为特聘顾问，我原想在疫情消停后的春暖花开之时在中南大学召开校外专家聘请大会，届时请您到场，我要将镀金的聘书庄重送到您的手中。那一刻，既是您一生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心的荣幸。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聘书，却再也无法颁发了。真是遗憾啊。

然而，世上再无黎树祥。我眨巴着眼睛，用拳头擂了擂额头，有微微的痛。从今以后，我去叶兄家，那个乒乓球台不再有您扣球的身影和开怀爽朗的大笑。

世上再无黎树祥。我亲爱的黎伯伯，我可敬的忘年交。从今以后，在您长沙西街花园的家里，逢年过节，国内的，国外的，您的所有的亲朋都来了，当然我也一定在，多年来，我早已把您和您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我们都在谈起您生前的故事，而您却在空中，默然而微笑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举杯，您才发现，为您准备好的碗筷您无法拿起，您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

世上再无黎树祥。这是真实的。从今以后，女儿呼唤您，您不再回应；女婿孝敬您，您不再领情；晚辈们给您买来的各种各样的礼物，您不再接受。只有清明的细雨中，您在远远的山头等待着亲人们去看望您。大家在您的坟头跪拜、烧香，铭记您的恩典。山清水白，泪流满面。

窗外，仍然是狂风暴雨，恰如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亲爱的黎伯伯，2023年1月30日上午10时，叶兄和黎姐及家人将在长沙河西潇湘陵园为您举行追思会，亲朋好友都到场哀悼，唯有我滞留国外，无法亲临现场，虽然十分遗憾，但我面向故乡、面向您离开的方向，为您焚香祈祷：天堂没有疫情，没有喧嚣，也没有病痛。您可以开心地打球，快乐地游泳，平静地写着日记。偶尔，你回头看看人间，那里青山绿水，不仅有您的亲人、您的朋友、您的忘交年，更有您的风声雨声笑声，以及您无法割舍的一切。

安息吧，黎伯伯。

腾挪说对仗

■李昂

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也是它的亮点。好的对仗犹如一座桥梁，把不同时间、空间的意象巧妙地连接起来。本来意象之间有着很大的跳跃，而读者心理上却不感到跳跃，只觉得是自然顺畅的过度，从而在广阔的背景上领悟作者的情思。比如杜甫《秋兴》的两联：“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中，“江间波浪”“塞上风云”“丛菊”“孤舟”“他日泪”“故园心”这些意象在时空上有着很大的跳跃性，而通过对仗，却使它们浑成一体，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内涵。

对仗的方式，从内容上看，有正对、反对和串对。

正对即是将同类事物并列，一句意犹未尽，由对句相辅相扶，互相加强、印证。如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白居易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等等。

反对即是将矛盾对立的事物并列、对比、映衬，以达到相反相对的目的。这种对仗由于上下联写的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对句向另外的方向开拓，因而思路宽广，易于激发下联，故较正对为优。如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有无”）、“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多少”）、“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明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去留”）、“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分合”），等等。

串对又叫流水对，上下两句为一个整体，而把一句话分成两句说，上下句缺一不可，而又不可颠倒，并要字面相对。如骆宾王的“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等。

还有一种映对。即上下句意映衬对，但有主次之分，一为正意，一为旁衬。如杜甫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上为正句，下为衬句；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上为衬句，下为正句。

钱钟书《谈艺录》中归纳了一种复词句式的对仗。如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李商隐的“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白居易的“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石曼卿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等等。

运用对仗，要避免板滞的毛病。一是要避免勉强凑对。虽用对仗，仍要力求句子之间有一种流动的神韵，读来一气贯注。试看郑綮《老僧》的中间两联：“冻瓶黏柱础，宿火隐炉灰。童子病归